

■聚 焦

文化的哲理之思

——品云杉《文化的非洲》 □长 鸣

恕直言，笔者早过了文艺、文学青年那个年龄和阶段。近些年，对形而上的理论关注、思考多，对文学作品接触比较少。但最近偶然的机会，一口气读完了2012年第3期《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作者云杉的散文《文化的非洲》。读过后，闲暇来，还被此文所吸引，思绪常渡江过海飘到非洲去。

打开世界地图，从埃塞俄比亚始，经坦桑尼亚，再到津巴布韦，这三个国家连起来仿佛像一张弓，静卧在东非大地上。在《文化的非洲》中，云杉以清新优雅的文笔，向读者再现了对这片古老土地的文化亲历之旅。作者走进博物馆，凭吊人类远祖；驻足古都遗址，遥寄历史情思；观赏非洲歌舞，通解艺术本质；接触野生动物，抒写生态文明；步入古朴村庄，揭示建筑之美，通过一幅幅具体、生动、鲜活的现场情境，以人文的情怀、历史的眼光、民族的关切、世界的胸襟，抒发着对文化的思索与见解，传达出一连串深邃精美的思想。人文情怀与哲人之思构成主韵律，浸透着全文。

非洲是人类最古老的发祥地。作者告诉我们，埃塞俄比亚的“露西”古人类化石，距今已超过320万年，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伟大的人类是从埃塞俄比亚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走出来的，人类文明的曙光是从这里升起的，这里是人类的故乡。”这富有历史哲学高度的话语，不仅将读者带到人类文明的始点，而且蕴涵着人类历史统一性的深刻哲思。

这反映了作者的世界情怀。作为来自中国的东方人，作者对非洲大地的挚爱、对非洲文明的礼赞，从本质上说，是基于对人类文明的深思，是作者世界情怀的自然表露。他赞美非洲历史文明，同时纠正对非洲文化的傲慢与偏见，其出发点，笔者以为就在于弘扬清新、健康、激越、多样的文化。

这种文化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人类共同祖先应当和必须持有的崇敬。在简陋的埃塞俄比亚国家博物馆，作者抒发的是超越种族、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情思。因为这里供奉着“名副其实的人类的祖母”，是“人类共同的祠堂”，是“已有70亿庞大群体的人类的祖庙”。在这里，无论哪国人，都应虔诚膜拜。生产力发展打破原始公社生产关系的外壳带来了私有制的诞生，把人类分为不同的阶级，这曾是人类历史的重要进步。但历史永远没有句号，世

界最终必然实现大同。作者从中华民族崇敬祖先的传统美德出发，生发出对人类大同良知的呼吁，不仅表达出世界公民的情怀，而且传达了人类最终共同归宿的文化理念。

笔者为作者这种世界最大同的情怀所折服。它源自民族，却走向世界；走向世界，但与民族情怀完全同构。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写道，中华民族寻根问祖，“除了到大槐树下、到炎黄故里、到山顶洞前去感恩叩拜，还应该走进非洲大陆，走到埃塞俄比亚来，因为这里有我们祖宗的祖宗，有人类真正的故乡。”

从大槐树到埃塞俄比亚，作者阔大的胸襟与思路不仅跨越时空，而且对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特殊性与统一性进行了纯净的洗练。作者认为，“一个家族要敬仰自己的先人，一个民族要礼敬自己的历史。而人类，当然也要敬仰自己迈出第一步的出发地，每一个人都要记住和珍视自己是从哪里走来的。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怎么可以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呢？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不珍视自己的历史文化，自然是无法面向未来的。”联系到邓小平所说的不忘“老祖宗”，联系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表现，这是很值得读者沉思的。

“文化是没有边界的，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走向世界而不泯灭民族特性，弘扬民族特色而不僵化保守，这是有体有用、辩证统一、开放进步的文化观。作者认为，一个文明社会的现代人，“该有这样的人文观念和人文情怀”。我们不仅回望民族的祖先，而且回望人类共同的祖先，如此而“多一分智慧、多一分淡然，也多一分走向远方的自信和坚定”。笔者以为，作者所归指的，正是各国人民经过千百年的艰辛奋斗必然最终归于大同的这一文化努力方向。

世界情怀与民族情怀并非对立，而是有机统一。所谓民族情怀，还可翻进一层含义，即不能将本民族的情怀强加给另一个民族。对于其他民族的健康情怀，不应鄙视或敌视，而应与之共享。“美丽是不可以称霸的，再美丽的花也不可一花独放”。这样的民族情怀，当然也是一种世界情怀。在作者笔下，民族情怀非但不是障碍，恰恰还是津梁。

因此，驻足于古老的非洲文明遗迹之前，感受着当地人蓬勃的文化自豪感，作者与当地人一样，大生敬畏与豪迈之感。它也引发作者

思索：“历史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历史遗存是一部看得见摸得着的具象的历史”。作者提出：“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都是以文化形态传承的，都是以文化符号、文化遗存书写和记忆的。”“历史和文化是一对情侣，如影随行。”原来，历史文化并非前行的重负，而是前行和复兴的强劲力量的源泉和精神寄托。有了它，即使物质上贫穷，精神上也会富有并会最终带来物质上的丰饶。世界文化的历史，不仅书写着各个民族的文化文明史，而同时记载着强盗在世界范围内掠夺其他民族的文化珍宝史。作者认为，文化生成有其自身的过程与规律。“物质方面可以一夜暴富，文化上不可能一夜暴富”。“文化不可以有暴发户”。因此，“靠野蛮的侵占和掠取”绝不会建设成民族文化。文化只承认积累与传承，不承认掠取与霸权。反对文化霸权是人类进步事业的一个重要标准。

显然，作者的见解是建立在人间正道、建立在对人类历史文化充分尊敬的立场上的。没有尊重，就没有同情的理解，就不会洞悉历史文化的要义。

在这篇极富精美之思的散文中，作者还抒发了深挚的艺术情怀，表达了崇尚本真、推崇天然、以真情实感为内容、以活力淳朴为手段的艺术观。这种艺术观，是建立在对历史文化充分尊重的基础之上的。作者写道：“艺术的本质是人的观念、情感、魂魄的文化表达，离开情感和精神，所有形式和技巧都与艺术无关。”从这种艺术本质论出发，作者热情讴歌坦桑尼亚民间歌舞，因为这种歌舞是人的本能的迸发、生命的律动，是舞者“心底里情感的宣泄和倾诉”。它真诚本色、朴实无华、不加修饰、自然而然，是“没有污染的绿色艺术”，“纯洁的艺术”。中国的“原生态”歌舞艺术，就具有同样的特质。

这种最真实的艺术，其“源泉就是人民、就是生活、就是山野沃土”。而人民、生活与山野沃土，也正是历史文化的源泉与舞台。它给人们以最显著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真实与真切。背离真实与真切，即是虚假。

虚假的艺术往往以神坛、宫廷、名利场为载体，以逢迎、讨好、表演、作秀为目的，以虚情假意、打情骂俏为内容，荒唐无味、无精打采。它们是真实的敌人。而真实的第一要义，是信仰的真实。“艺术应该是一种信仰——

一种近乎宗教的信仰”。没有真诚的信仰，就不会有真实的艺术。“艺术的本质和艺术的品质应该是相融相通的”。品质低劣，归根到底源于背弃本质。所以，不立足于艺术本质，而欲“提升”所谓艺术品质，只能是南辕北辙，事与愿违。因此，将技巧展示、声光电展示当做艺术去推销，甚至将其当做艺术的本源，不仅舍本逐末，而且会成为艺术的灾难。

作者对艺术本质的揭示，对艺术规律的体认，对艺术创作方法的指引，对形式主义制作方法的批评，可以通过大量的艺术实践予以验证。要指出的是，作者的这一艺术观，既以人类的历史文化为积淀，立足于传承与弘扬，而且极富开放性，为艺术创新与创造打开了无限广阔、丰富的前景。因为，只要人类的历史文化不绝，只要人类的情感不灭，这一艺术观就具有恒常的真理性。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一艺术观与所谓的时尚前卫艺术不合拍。其实，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最前卫最时尚的文化艺术中，都可以找到非洲艺术的元素和基因，无论是风靡世界的现代舞蹈，还是时髦流行的摇滚说唱，哪一样没有非洲歌舞的影子？”可见，艺术形式可以万般变化（而且必须如此），但艺术的本真千古不变。没有对艺术本真的真切体认，即使给艺术穿上再炫目的服装，也只能如中国古语所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艺术没有边界，艺术形式的本质只有一个。同样，文化文明也没有边界，文化文明的民族形式必然内地蕴含着人类文化文明的共通性，这是人类文化相互交流、相互欣赏的前提与基础。因此，中国艺术与非洲艺术不一样，但彼此照样相互喜爱。之所以喜爱，是源于各自艺术的民族特性和独特魅力。民族特性和独特魅力，可以穿越民族界限，在对方的心灵中引发共鸣。“人类对美的追求是共同的，人类对美的评判标准也是相通的。古人、今人，东方人、西方人，在美丽面前人人都会折服。”

所以，“真正可以走出去”的文化，恰恰是“那些正宗的、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魄的东西”。失去民族之根，等于失去特性、魅力与津梁，也就谈不上令他人折服！

可见，无论对历史文化，还是对中外艺术，作者的思考与见解都饱含着历史哲学层面的深思、实践层面的引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将来”，集中体现了作者人文情怀与哲

学思辨之精髓，体现了古今中外辩证统一、圆融共通的大家风范。

以这样豁达的人文情怀与哲人之思去看文化交流，必然是相互尊重，多样一体。“文化如果整齐划一了，必将是世界的一场文化灾难”。这不禁让笔者想起费孝通先生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里的关键，是对“美”的内容的诠释。仅仅“美人之美”，甚至不惜充当洋奴；或者仅仅自美其美，不惜施展霸权，都是人类之祸。作者赞同这样的口号，即“中国是世界的舞台，世界是中国的舞台”。当代中国具有这样的博大胸怀与文化信心，它也应该成为人类共通的文化理念。

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的多样性是文化交流的根本前提和归宿。没有多样性，交流就无法谈起。交流必然带来交融。“交流是趋势，交融是必然”。“在交流中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碰撞。碰撞的火花就是灵感，碰撞的前方可能就是一片文化创新的天地”。文化创新之后，将更加呈现民族的特性。作者所宣示的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自信，而且揭示了文化交流的规律、点明了文化交流的规则。

将人文情怀引向生态，作者警醒式地提出：“生态文明就是人要对动物讲文明，对大自然讲文明。”这既是站在时代前沿所作的文明宣示，也是对人类前途命运发出的哲学警策。作为万灵之长的人，如果不能善待动物，最终将殃及自身。作者以强劲的笔触写道：“该是人类向动物还账的时候了。文明的人不应当企望把整个地球都霸为已有，那样的话人类最终将失去一切！”在此，作者大大拓展了对文化内容与范围的理解，指出人类文化不应局限于人与人的关系，“还应该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当然还有保护自然、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都应该属于文化范畴”。这是对文化内涵的崭新解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极具前沿性与先进性的文化理念。

从前沿与先进性的文化理念看，“经济落后”而“文化先进”的非洲人对动物的关爱，才真正是世界的楷模，才最值得崇敬与效仿。在中国及世界许多地方，“从政府到民间都在弘扬生态文明，呼唤生态文明，实在是人类或者说是一个民族在文明进程中的一次飞跃”。笔者以为，在对生态文明的深刻揭示中，作者的人文情怀也达到了升华与飞跃。

生发开来，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全球化应该是文化多样性的工具，不应是承载文化霸权、文化专制的“加速器”。人是万灵之长，理应善待自然包括动物，更应善待自己的同类。正确处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解决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正在成为当今世界需要人类共同解决的紧迫课题。

这一代 ——读周密的散文集《回望》

□顾 骞

周密，周扬和苏灵扬同志的女儿，一位国防科研战线的火箭专家。她在晚年以宁静、恬淡的心态，回忆自己的人生道路，回味那逝去的岁月，追思已远行的双亲，捧出这本真挚、亲切、感人的《回望》。这本书，不仅有审美的感知，也有史料价值与社会学的意义。

周密的人生道路有着一定的代表性，类似她的有一大群人。他们大多在延安窑洞中度过童年，在解放区中学读书。那时候的解放区中学，有许多实际上是干部预备学校。经历了战争，“进城”（北京）以后，不少人进入当时著名的北师大女附中、101中学，毕业后，其中有些人较早地被选派出国留学，到苏联深造；不少人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或清华、北大等高校。他们如今都已进入古稀之年。这是在一定特殊历史年代的一个特殊群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红色一代”。我不喜欢动辄用“红色”这个容易引起歧义的象征性颜色形容词，如“红色经典”之类；是否也可用常人说的从延安走出来的高干子弟？我也不想用一种庸常的价值标准来统计方式来解析这一人群。比如说，这一人群中后来出了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多少位部长、将军、副部级以上干部占多少百分比，有多少位院士、专家、艺术家。我不想用这样的研究视角，我思考的是这“红色的一代”和如今令人侧目的“官二代”现象竟会有如此差距，这是如何演变的？这个究竟透露了什么样的时代信息？这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恐怕要从自由、平等、人权、法治、民主、科学这样现代文明观念在当代的命运中去考察，要从中国传统中的专制主义、官本位、等级制因素的消涨沉浮中琢磨。不过这对我来说已力所难逮，只有期之高明了。这一辈人，多数是“不搞特殊化的干部子弟”。既然是一个人群，出现某些颐指气使，出现某些纨绔子弟甚至“衙内”式人物也不足为怪；但是，总体说来，这是值得称道的一代。他（她）们大多数艰苦朴素，自强自律，为人低调。尤其是他（她）们具有一种可贵的平民意识，哪怕是天潢贵胄，都不许搞也不搞特殊。在北师大女附中同学间，平时从不议论谁是谁的什么人。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李讷都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平时住校，假日回家及返校，都和其他同学一样乘公交车，也无专人接送。北师大女附中规定学生星期天应返校上晚自习。一天，任弼时同志已感不适，拟挽留他的两个女儿远志，远征在家住一宿，隔天赶回学校上早自习。因她们未事先请假而未敢违规。第二天任弼时同志突发脑溢血，待姐妹二人赶回家时已临弥留之刻。五六十年代，我在一所高等艺术院校执教，当时有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女儿在该校附中读书，后升大学本科时，经考试分数未达标，未被录取而被刷掉了，转到另一所学校读书。这件事，学校师生没有去特别关注，也没有什么议论，都感到极平常。校方处理此事也未感到有什么为难与棘手之处。

特殊化之风蔓延，特殊阶层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文化氛围与政治机制培壅，有一个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红色的一代”在成长中，这一过程刚刚开始，还不显著。虽然，那时已出现了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出现了一个被称为“四类分子”（反右后加为“五类分子”）、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贱民”阶层。比如像哈军工这样的学校，十大元帅中有七位的子弟或亲属就读，对于“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哈军工恐是禁苑，但是总体说来，那时特殊化的社会风尚还未形成气候。“进城”以后，这一群高干子弟的父辈刚刚打下江山，坐上江山。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的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被喻为“鱼水”关系，鱼离开水就不能活，这些干部子弟们和父母一起，也都是吮吸

农民乳汁长大的，有些人就曾被寄养在农民家中。他们都过着“军事共产主义”式的供给制生活。战争岁月刚刚过去，集体记忆还很深。这就是当时的文化环境。

这一人群的父辈，大都是理想主义者，哪怕有些是“乌托邦”的理想，但精神是高洁的。他们不是用“寻租”手段实现官商勾结的权贵利益集团。他们对子女们言传身教，泽被后人。也在北师大女附中读过书的陶斯亮曾写过一篇感人至深的祭父文，推动了对陶铸同志的平反昭雪。斯亮侍母至孝，在母亲曾志同志去世后，她写过一则祭母文，其中有句：“……你对物质生活的淡泊与您对精神信仰的执著，形成巨大反差。这正是您品格上的最大特色”。

这就是这一代人成长的生活环境与所受的精神文化滋养和品格熏陶的渊源。

周密在上海出生，抗战爆发后，随父母到陕北延安。抗战胜利后，又随父母在华北解放区四处转移，断断续续在解放区中小学上学。“进城”后，在她母亲任校长时间最长的北师大女附中读书，毕业后留苏，入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归国后，默默在航空科研战线搞技术工作。“文革”前后12年，那是她苦难人生的12年。周密被扣上“文艺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总头目”的罪名，周密先是被称作“黑帮狗崽子”，继之，本人也被打成“攻击‘旗手’江青的现行反革命”，被多次批斗。“文革”后，她父亲周扬又蒙受一场冤案。送走了双亲，又结束了她和叶挺将军之子叶华明从青梅竹马的朋友到结为夫妻的20多年的婚姻生活，转瞬间已临生命的晚秋，回首前尘，往事历历，沧桑无限。周密的发小、同学、吴德同志之女吴铁梅，大学读书是选择专攻秦汉文字的专业，大学毕业后，挑选了一个远离政治与社会的文物考古部门工作多年。无论在她父亲青云直上、门庭若市时，还是在她父亲时运衰退、门庭冷落时，面对兴衰荣辱，人情冷暖，她都泰然处之。听铁梅说话，像是位看破红尘的老人，又像是修行多年的智者。周密何尝不是如此？80年代，周密历经上海，会晤了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王平。当年在延安桥儿沟，周密带着她弟弟苏苏，王平随他姐姐力凡，是亲密的玩伴。苏苏和王平刚蹒跚学步，是两个姐姐甩不掉的小尾巴。如今周密失势，力凡丧偶，儿时不再，能不黯然神伤？她目睹了历史的兴衰、白云苍狗，阅尽了人事沧桑、鱼龙变幻。如今，她不带情绪，冷静地写出了诸多人和事，记叙了她所接触的长辈，她童年和青年时的朋友、同学，写得具体、生动、率真、坦诚。她有很强的细节记忆力，活泼的文字功力，满纸沧桑感。全书有很大篇幅记述了她的双亲，特别是周扬蒙难入狱和释放的生离死别的历史时刻，叙述凄楚动人。

对于周扬同志的晚年，我在20年前写的《晚年周扬》一书中，对他的历史价值定位是：新时期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先驱人物之一。经过20年的深入思考和对当前现实的历史观察，对周扬的评价仍有未到位之处。从梁启超喊出“人权万岁！万万岁！”到将“保障和维护人权”写进宪法，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的人权思想史经历了百余年漫长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周扬在马克思恩格斯百年大会上的报告，是中共迄今90年历史上第一次一位意识形态领导人公开文献中，在一个庄严的场合对人权和人道主义的全面反思和突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家“咸与改革”，考察3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存在两种改革路线，一种蹩脚的片面改革路线，就是只改经济，其结果是8个字：“经济崛起，社会腐败”。经济发展也很困难。邓小平同志说，光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改革不会成功；另一种是胡耀邦同志力主的“全面改革”路线（参阅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周扬同志则是用他的思想理论与实践证明，他是坚定地站在全面改革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

对于苏灵扬同志，周密的记述使人了解更多，灵扬同志不仅是周扬夫人，她本人原是左联的一位文艺战士，她也是一位颇有业绩的教育家，至今，在北师大女附中读过书的学子，都还亲切地记得“苏校长”。

总之，这本《回望》是有价值的。

人们常说：作家和评论家像一部车上的两个轮子，两者协调运转，才能使我们的文学得到健康的发展。我赞同这种说法。不久前，同武汉大学教授、评论家陈美兰的一席交谈，使我得到很大的启发。

先从一部线装书说起。在陈美兰的书案上，放着一部作家出版社刚刚出版的雅致的线装本《白鹿原》，这是作家陈忠实亲自签名最近寄赠给她的。据说这部线装版印数很少，能得到作家亲笔签名本，可以看做是读者的一种荣幸。我问陈美兰：“你同陈忠实熟悉吗？”她答：“不熟悉。仅在两年前的一次会议上见过一面。”我问：“你写过陈作家的评论吗？”她答：“没有。《白鹿原》出版后仅写过一篇千把字的短文，发在一个不起眼刊物上，陈忠实也未必看到过。”

我之所以关注这件事，是因为报刊上对于《白鹿原》的评论文学已经汗牛充栋，像陈忠实这样大的作家，对一个并非身居要津的写评论的大学老师的友情，表现出陈忠实为人的大度，也启迪人们，一个评论家如何才能取得作家的信赖。

陈美兰是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从教50年来，除了做好当代文学的教学和带研究生的本职工作，还从事当代文学的评论和研究，担任过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和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上世纪80年代，她到北京参与主持教育部命编的当代文学统编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她本人还出版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和《文学思潮和当代小说》两部专著。同某些评论家比起来，她的著作数量并不算多，但她的这两部专著都获得过全国社科优秀成果奖或其他奖项。最近出版的《我的思考——在当代文学研究路上》也获得了广泛好评。

作为一位在新时期涌现的女评论家，陈美兰的文学评论受到评论界和创作者的关注和依赖，还因为她具有严格治学精神和坚持评论家的学术操守。2002年，她在认真读了100多部长篇小说之后，写了一篇4000多字的评论：《这个时代会写出什么样的长篇小说》，探讨了长篇小说创作在艺术探索与精神探索中的不平衡现象，此文在《文艺报》上发表后，获得巨大反响，用时髦的说法叫“轰动效应”。评论家仲呈祥在读了这篇文章以后，情不自禁

地写了《治学精神与学术操守》一文，称赞陈美兰的文章：“是一篇厚积薄发，秉笔直书，真知灼见，大家风范的佳作。读之令人感慨良多，受益匪浅。我不禁要为这篇难得的文学评论放声叫好。”（见2003年1月25日《文艺报》）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书记的王巨才也说过：“像这样的文章应该由我们作家协会的人来写。一个大学教师写出这样的文章，难得啊！”可见，这篇文章获得全国文联的奖励并非偶然。我在这里重提这篇文章，也是有感于这篇文章给人的启示并未过时。

我们回过头来看当时的评论。当代的文学评论成绩当然不可低估，但日益显化的不良倾向也不断受到读者的诟病。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炒作”，一类是“酷评”。“炒作”者，多为人性和铜臭所污染，往往空发议论，文不对题。“酷评”者，则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我看，那些不靠谱的炒作和酷评表面上热热闹闹，但热闹背后是冷漠，都无益于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和文学创作的真正繁荣。

我认为，陈美兰的评论，既无炒作，也无酷评。她往往以自己的真知灼见，一扫世俗庸俗。陈美兰是大学里的“教书先生”，但她的文风却不是“学院派”的。她贴近时代、贴近现实，从实际出发，言之有物。她不跟风、不浮躁，只踏踏实实地研究思考。她的大部分评论都是有的放矢的。她往往能辩证地去评论一个作家，既充分肯定作家在艺术探索方面的成绩，又以锐利的辨析评议作家在精神探索方面的某些缺陷和不足。她是敢于批评的。不论作家地位高低身份贵贱，不计与作家关系之亲疏远近，都能秉笔疾书，不留情面。比如，她对文坛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作家张炜、莫言、贾平凹、王安忆、阿来、张承志、刘震云等人的作品，甚至他们已经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不为显者讳，不为尊者讳，都实事求是